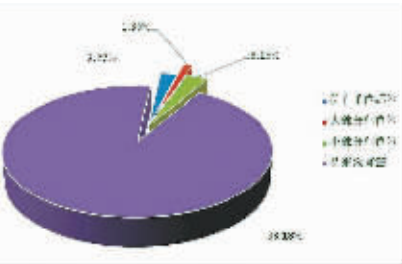


因患病晚期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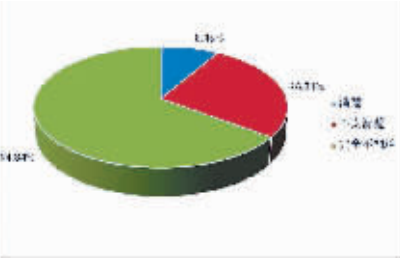
82%尘肺病农民工在家里去世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发布,尘肺病农民工深陷四大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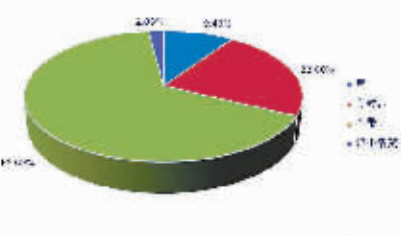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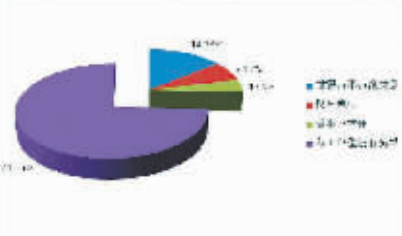
是否清楚粉尘工作对身体的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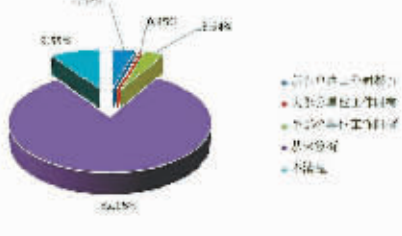
干活时是否佩戴防护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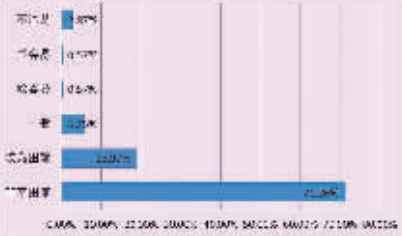
没有佩戴防护面具的原因



获得工伤保险的情况



申请赔偿的困难程度



新疆:“就业工场”实现家门口增收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9日电 (记者熊聪茹)今年以来,新疆一些地方盘活本地特色资源,创建乡镇“就业工场”,培育投资少、用工多的小微产业项目,有效拉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在位于伊犁河谷的霍城县央布拉克村“就业工场”,30岁的夏力万古丽正在车间指导20多个妇女缝制一批民族特色服装。“她们都是当地农民,简单培训后就能加工服装,熟练工一个月能挣1500元。”夏力万古丽笑着说,“来找我们做衣服、做校服的多得很,根本忙不过来。”

夏力万古丽曾在正规服装厂学过缝纫技术,回家乡创业是她的梦想。这家“就业工场”约20台设备通过镇政府购置、江苏援疆前方工作组捐助和自筹3个渠道解决。场地在老村委会基础上改建,免费提供,仅此一项每年可为夏力万古丽节省5000元。

霍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江莉红介绍,今年全县利用村镇、社区闲散土地和空置办公场所建设30个“就业工场”,引进生产有订单、技能要求低的小微企业,培育民族刺绣、薰衣草及茶叶加工等小微产业项目,年底可解决就近就地就业800人以上,带动就业1200人以上,实现富民增收3000万元。

为防止“就业工场”成为“短命工程”,霍城县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措施。

今年6月,国家拨付1.32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新疆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硬件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此前研究制定了90项具体措施,16项实施方案力促就业。

本报记者 郑莉

“高达82%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终在家里去世,因为他们在患病晚期已经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了。”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十分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28.26%的家庭变卖过家产”。

“只有10.26%的用人单位经常提供粉尘防护面具,而71.56%的用人单位没有给工人提供防护面具”……

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中,一组组数据敲击着人们的神经,这是接受调查的501个尘肺病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全国逾百万尘肺病患者的现实生活。

困境1:死亡阴影笼罩村庄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48.5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

76.9%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有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困境2:负债累累压垮家庭

以门诊为例,33.13%的人一分钱未报销,47.46%只报销1000元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入不敷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24804.9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2.5倍,最多的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12364.8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33.13%,只报销1000元的为47.46%。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95.7%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

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人不抵支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22.3%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16.14%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困境3:获赔偿需等17个月

74.3%未申请过赔偿,申请者中82.7%未获得赔偿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25.72%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74.3%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17.3%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82.7%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31.5%的人依靠政府部门,35.6%的人主要靠自己,13.7%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

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和拖延时间长;用人单位推卸责任;政府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困境4:保护缺位致重蹈覆辙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10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9.33%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10年以上的占到52.09%。98.9%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87.7%)和工地(7.19%);有80.73%为民营企业;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15.35%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62.6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25.34%的农民工只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74.16%的人表示用人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6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人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83.41%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0.14%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过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93.2%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尘肺病农民工综合救助模式待建立

将诊断、赔偿和劳动关系的认定分离,以免患者在急需救命钱时被“踢皮球”

本报讯 (记者郑莉)“政府对于尘肺病农民工的帮助力度和广度还有很大拓展空间。”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2014)》中,有关专家建议以地区为单位,探索建立政府、社会力量与农民工三方合作的尘肺病农民工综合救助模式,从而减轻尘肺病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重负。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通报,公布我国2013年报告职业病数量为26393例,其中尘肺病23152例,占总数的87.72%。近年来,新增尘肺病病例以每年超过2万的速度增长。更令人担忧的是,大量的职业危害因素集

中,问题严重的中小企业和乡镇、私营、个体企业职工,并不在获取我国职业病统计数据的健康监护范围之内。保守估计,尘肺病实际患病人数将超过100万例。

“逾百万农民工的尘肺病,涉及到千万人的生活。我们不能看着这样的群体在病痛中死去,看着他们的家人陷入困境。”参与调查和报告撰写的专家和志愿者有着共同的感受:救助尘肺病农民工是各级政府和国家应当担负起的责任。

根据本次调查显示,尘肺病农民工一方面需要支付大量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多处于

失业状态使他们的生活难以维继。仅有29.5%得到低保支持,70.5%没有得到,且每个家庭每个月可以得到低保的金额在400元以下。大量已经患病但无法找到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农民工,急需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救助。

有关人士建议,建立三种救助方式帮助尘肺病患者走出困境。包括将尘肺病确定为国家保险或工伤的全民保险;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对尘肺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和社会救助,按照市级统筹、省里支持的方式,在各地建立尘肺病农民工生活救助专项资金;设立国家尘肺病专项基金,基金可以由中央财政

安排或从现有工伤保险基金中的冗余部分安排。此外,对于病情较轻的农民工,出台专项措施,根据身体状况,指导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帮助他们的家庭“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则建议,在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加大违法追究力度的同时,把尘肺病的诊断、赔偿和劳动关系的认定分离,劳动者出现疑似病症,就可以到相应的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尘肺病后即应得到全额或者绝大部分的赔偿,然后再追溯劳动关系,“以免尘肺病患者在急需救命钱时被‘踢皮球’”。



河南安阳:

留守儿童舞动暑假

7月8日,留守儿童在河南省内黄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学习舞蹈。

暑假来临,河南内黄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舞蹈房出现了许多留守女童练习舞蹈的身影。

刘肯坤/CFP

(点评:杨召奎)

不必为绿皮车谢幕而惋惜

所以部分农民工还愿意选择这样的列车是另有原因的。

对于外出农民工而言,乘坐火车往往是因为回家或变更打工地点,这样的旅途往往要携带铺盖,甚至拖家带口,需要购买多张车票,几百元的动车和高铁票价看似不多,若乘以全家的人数,再乘以往返的2次,实际成本就到达四位数字了。更何况动车和高铁设站区间较大,通常在地市设站,而居住在县城的农民工,下车后还要再倒汽车,又增加了一笔支出。绿皮车一来票价便宜,站点密集,二来绿皮车的乘客以农民工居多,背着行李袋不会遭到异样的眼神。

当然,动车组和高铁取代绿皮车等普通列车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现代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促使铁路客运不断进步,不断为乘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对于跨省务工人员来说,铁路是主要的出行工具。长长的铁轨,连接着城市和乡村,一头是等待,而另一头则是梦想。

一方面来说,不能因部分人群怀念绿皮车的票价,就推迟整体路网的提速更新,这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应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原绿皮车乘客群体,提供可替代的出行方式,例如在动车和高铁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后,可以适当降低票价,并发挥公路客

运的补充作用,以减少他们的出行成本。

其实,就今天的农民工而言,收入不断提高的他们,也不见得全部钟爱绿皮车。在最近两年的春运中,农民工群体搭乘高铁甚至飞机返乡已经不鲜见。蛇皮袋被拉杆箱取代,破胶鞋变成了新皮鞋,行李里装着存折,那是准备回家买房买车的款项。富裕起来并不断融入城市的农民工正在蜕变成新市民,他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也自然在发生变化,甚至对交通工具的舒适度和速度需求,渐渐超过了价格需求。换言之,虽然依然有农民工青睐绿皮车,但不等于农民工只配坐绿皮车。单纯用“农民工没得坐”为绿皮车的谢幕惋惜,显然已经

不合时宜。

飞驰而过的列车穿越暮色中的城市,它们承载着的不仅是留守老人和儿童的思念,也是新市民的梦想。希望有一天,农民工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成为动车和高铁的常客。到那时,不仅仅说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已经成功在望,而且农民工向新市民的转型,也已驶上“高铁速度”的快车道。

